



China



USA
UK
CANADA
ITALY
FRANCE
AUSTRALIA
JAPAN
SPAIN
GERMANY



留学回国

主 编 杨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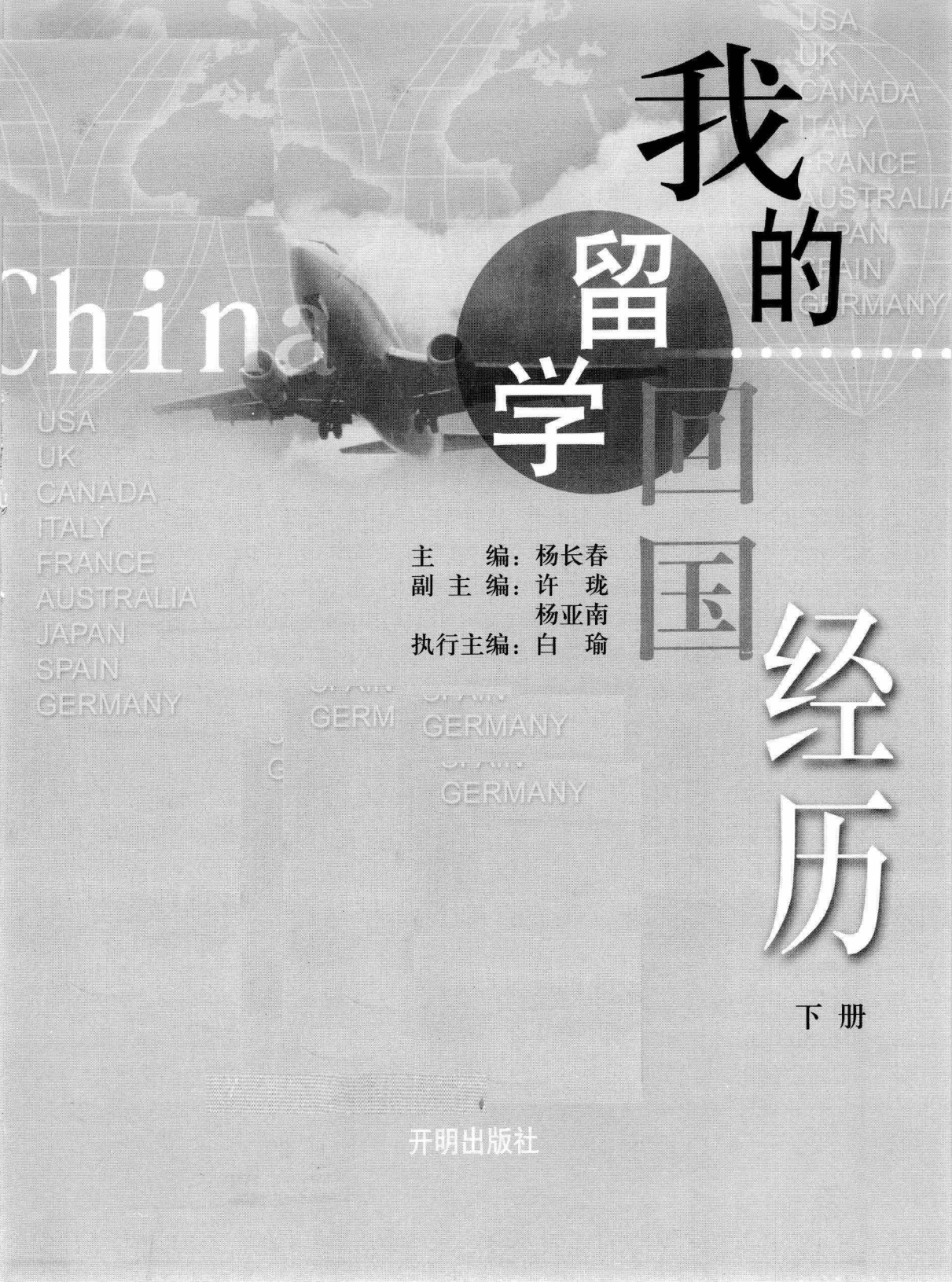
我的

国

下册

经历

开明出版社



China

我的

留学

回

国

经历

主 编：杨长春
副 主 编：许 珑
杨亚南
执行主编：白 瑜

下 册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留学回国经历 / 杨长春主编

— 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9

ISBN 7-80133-920-7

I . 我 ... II . 杨 ... III . 留学生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5410 号

我的留学回国经历

主 编：杨长春

副 主 编：许 珑 杨亚南

执行主编：白 瑜

责任编辑：段风华 徐 妍 曹 喆 焦江方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出版：开明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邮编：100089）

印刷：北京瑞宝天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24 开 印张：22.75 字数：30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3-920-7/J · 101

定价：57.30 元



屈冬玉

屈冬玉，1963年出生。1983年湖南农学院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遗传育种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一直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承担26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948”项目、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

1996年2月14日，我在世界著名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农业与环境科学博士学位，主攻遗传育种方向，成为该校历史上用比较短的时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人，受到学校的褒奖。

我也因此被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公司争相挽留。留下来，不无诱惑的科研环境和物质利益都将接踵而至。但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作为被祖国多年培养和老一辈科学家托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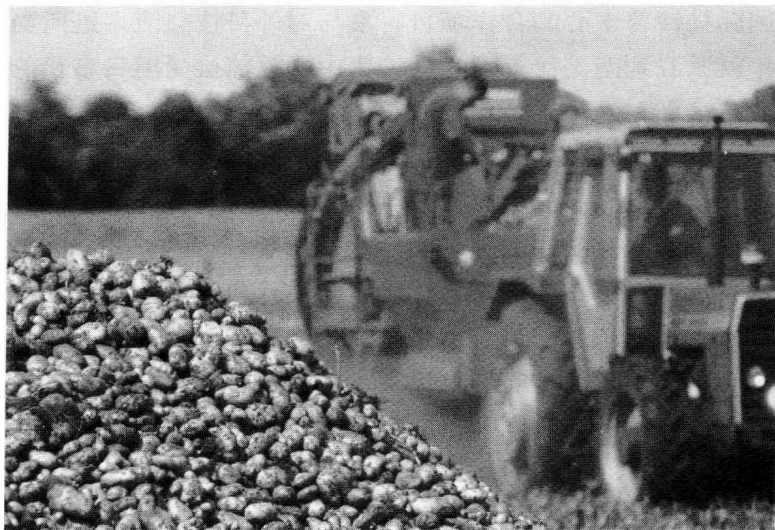
祖国的沃土
却尽其所能，提
供了任我驰骋的
广阔空间。

起来的新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身后亿万农民的殷殷期盼，让我须臾不敢贪恋眼前的一切。我婉言谢绝了导师的真诚挽留，推掉了一些大公司高薪相聘的好意，带着同学和朋友的美好祝愿，毅然踏上归国之路，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神州故土，投入到祖国农业科研的主战场。

回国后，虽然物质条件和科研环境诸多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是祖国的沃土却尽其所能，提供了任我驰骋的广阔空间。我在农业科研和管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成为国家“863”生物技术与现代农业领域的主题专家；中国园艺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农业部蔬菜品质检测中心主任；中国科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2001年12月，我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这些年来，随着肩上担子的不断加重，我的眼前也越来越多地浮现出亿万农民同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场景，每当这时，我就如背受芒，使我丝毫不敢懈怠肩负的责任。

故土情结

我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一个有书香传统的农民家庭。从小，父亲就鼓励我要读好书、做好人，将来成为一名有用的人。在老师和家人的教诲下，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好学。15岁那年，我以高分考取了湖南农学院园艺系。村里的乡亲都来为我送行，长辈们反复叮嘱我，咱农民的孩子有上大学的机会就是造化，走出去是福，但家才是本呀，将来翅膀硬了可不能忘了这个本啊！我带着家乡父老沉甸甸的嘱托，揣着一颗惴惴的心跨入了大学校门，在知识的海



洋里畅游。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和知识的日积月累，我越来越感到，作为新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只有把祖国八亿农民装在心里，把情系于改变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上，去为之奋斗，为之献身，才能谱写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大我”。

1983年，我又考取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思想内涵有机会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和提高，使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更加自觉地与国家农业和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紧密地溶在一起。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工作。在这里，金善宝院士、卢良恕院士、朱明凯先生、方智远院士、朱德蔚先生等老一辈农业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事业执着的追求深深地感染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献身农业科学事业的决心。研究生刚毕业，所领导安排我主持

只有把祖国八亿农民装在心里，把情系于改变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上，去为之奋斗，为之献身，才能谱写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大我”。

作为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只有瞄准世界最新成果，最高水平，去为之努力和拼搏，才能够不负祖国重望，才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尽早脱贫致富。

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合作项目，参与对外科技交流，进所当年就派我到南美秘鲁国际马铃薯中心总部接受项目官员的业务培训。

初出国门的我，接触世界最新、最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亲历世界一流农业科技团队，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震撼，深深感受到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的差距，也让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只有瞄准世界最新成果，最高水平，去为之努力和拼搏，才能够不负祖国重望，才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尽早脱贫致富。于是，我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了解世界农业科技的新动向、新发展，更加认真地学习把握新知识、新成果，努力锻炼和提高自己。

1992年，为了完成正规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梯，全面体验国际观念，培养全球视野，进一步更新知识，我有幸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继续深造。校方对我过去几年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所达到的学术水平给予了认可，破例允许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仲春5月，带着对祖国神州沃土的无限眷恋和神圣的使命，我飞赴美丽的郁金香之都荷兰，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

导师 Jacobsen 博士是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具有很深的造诣，同时还是一位渊博、开明的智者。我是他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很快就得到了为人直率的他的赏识，并且成为他科研工作的得力助手。我们相处融洽，他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在瓦赫宁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一般需要5~7年时间，而我则想尽一切办法缩短这个过程，尽快回到祖国的工作岗位。我每天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和论文准备上，



很快就拿出了论文设计和研究思路，这不仅让导师和周围的人感到愕然，导师还破例推荐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到荷兰农科院讲课，我也因此在瓦赫宁根大学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在睁大眼睛了解和赶超世界，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就利用在国
外争取到的这个三尺讲台，不失时机地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让那些西方人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多了解一些发展了的真实中国，一时间竟然在瓦赫宁根大学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旋风”。荷兰农业国际中心(IAC)主动找到我，委托我帮助联系与中国的科技培训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也聘请我做项目执行咨询顾问。

由于我在专业学习与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完成学业后，导师和学院都真诚地挽留我。荷兰是世界第一花卉大国，花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荷兰的国民经济，我的研究方向恰恰就是园艺的遗传育种，在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我炙手可热，一些大公司纷纷提出以高薪聘我做高级职员。这时，远隔万里祖国也传来消息，我所在的研究所已经任命我为所长助理，只等我回去效力。留下来，我可以在专业领域铸就更大的辉煌。但是，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此时此刻，耳边又响起了乡亲们“不要忘本”的告诫，特别是1995年10月，时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的吴亦侠同志率团访问荷兰期间，校方要我作全程陪同，他的话像一团火鼓励我回国干事业。我更加感到，12亿人口的祖国正在改革的征程上爬坡，八亿多农民同胞正在殷殷期盼着农业科技的支撑，我的翅膀硬朗了，是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报效祖国尽绵薄之力的时候了。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任

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此时此刻，耳边又响起了乡亲们“不要忘本”的告诫，

院里安排我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扶贫团去贵州省的一次扶贫考察，竟又让我对马铃薯的开发与研究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

我理想放飞、驰骋的神州故土。

播种希望

出国留学前，我曾一度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学成回国后，我也曾想接着自己读博士期间主攻的遗传育种专业，搞一些基础性强的科研项目。但是，回国仅两个月，院里安排我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扶贫团去贵州省的一次扶贫考察，竟又让我对马铃薯的开发与研究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

我到贵州后发现，那里的48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竟有42个县的农民以马铃薯为主食。然而，在我国包括贵州在内的马铃薯主产区，却严重存在着单产低、品质差、品种退化严重等问题，人民生活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农民还在温饱线以下挣扎。这些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征得所领导同意后，我又重新承担起马铃薯遗传育种和种薯繁殖等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此后，我几次赴贵州与省扶贫办共同调研、会商，向他们提交了“贵州省推广脱毒马铃薯种薯温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并提出通过采用脱毒种薯和调整品种结构，改善栽培技术，推广300万亩脱毒马铃薯，以彻底解决50万贫困农民的温饱问题的建议。我的建议得到贵州省和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重视。

在随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克服重重困难，又十多次南下贵州，调集国内同行帮助当地建立起马铃薯脱毒快繁中心，引入脱毒苗品种40个，指导生产微型薯上亿万粒，在10个快繁基地推广脱毒马铃薯近500多万亩，年均增产



30%~46.3%。我还为贵州省各区县培训了近千名农业科技骨干队伍，通过他们把高产、优质的脱毒马铃薯迅速推广到千家万户，项目很快覆盖到该省42个县。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推动了脱毒马铃薯的推广，又达到了科技扶贫的目的，开创了用先进适用高新技术扶贫的成功范例，得到中央和贵州省有关部门的肯定。

在贵州获得成功后，我又不失时机地把这一成果向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宜的其他地区推广，比如在云南、重庆、西藏以及甘肃等地，现已取得明显成果。仅这一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就为农民创造经济效益40多亿元，帮助1000多万农民实现增收。

近年来，各种薯片及薯类休闲食品应运而生，但我国自己传统的马铃薯品种却不适宜于薯片生产，麦当劳等洋快餐也拒绝用中国产马铃薯。有电视媒体感慨道：“如果能让中国的土壤长出洋品质的马铃薯，那将是马铃薯产业的一场革命”。压力就是动力，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又开始向马铃薯遗传育种的新领域进发。马铃薯适合于冷凉地区生长，为了尽快拿出适合我国种植的高品质薯种，我把试验基地选在了海拔在2300米以上的塞北高原。

对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来讲，阳春三月早已是桃花飘香，春色满目，可这里却仍然是天寒地冻，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凛冽的寒风不时卷起黄沙，把天日遮盖得严严实实。塞北的暑季日头也分外地毒辣，干旱的黄土地被太阳一晒直往上冒烟，隔着鞋子都感到烫脚，可这时又是松土、浇水、考种、测产的关键期，为了获取可靠实验数据，我们吃住在试验田边简易的实验站。金秋九月收获天，塞北的初霜却已将田野无情地染成了白色，瑟瑟寒风中，我和课

压力就是动力，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又开始向马铃薯遗传育种的新领域进发。

人们期盼的
那场马铃薯产业
革命在全国同行
的共同努力下，
一步步走向成功。

题组的同志收获着大而整齐的薯块，品味着成功的喜悦，忘却了所有的苦累。寒来暑往，数个春秋，我们引进和开发了200多份马铃薯遗传资源，筛选出高淀粉、低还原糖、抗病等优良资源30余份，有些优异资源已作为我国马铃薯育种的骨干亲本。在这200多份新遗传资源中，筛选出了十余份适宜炸薯片、炸薯条品质的优良新品系。人们期盼的那场马铃薯产业革命在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走向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培育出早熟丰产新品种“中薯5号”、早熟抗病优异新品种“中薯6号”、适合于我国不同气候条件的加工品种“阿克瑞亚”等三个重要新品种，通过了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与荷兰Agrico公司合作选育的“红多”品种通过了河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育成的适合于二季作和我国南方冬作区种植的早熟高产、商品率高、外观好的“中薯1号”、“中薯2号”、“中薯3号”、“中薯4号”新品种已经在北京、河北、山东、福建、贵州等地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00万亩，这些新品种的开发成功和有效推广，不仅使我国的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为我国早日实现马铃薯品种本地化作出了贡献，还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近20亿元。

这些年来，我还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948”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20多项。其中“马铃薯2n配子遗传与育种技术研究”项目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该项研究中，我利用四倍体的单倍体与二倍体野生种杂交、筛选出优良性状，并转移到栽培中去，向国际传统的单基因控制理论提出了挑战，该项成果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结合研究工作我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国家一级刊物



8篇，国外刊物四篇，“ $2n$ 花粉的遗传规律”一文在国际权威刊物 *Euphytica* 上发表，主编了《马铃薯 $2n$ 配子遗传及其在有性多倍化和实生种子利用上的作用》（英文）、《中国蔬菜种业》和《中国蔬菜科技主要进展与问题》等著作 15 本，约 200 万字。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期间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农民富，则国家富；农业兴，则国家兴；农村稳，则天下稳。回国工作这些年来，我努力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紧紧联系在一起，勤奋工作，积极进取，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兄弟从自己的科技成果的研究、推广中得到了实惠，走向了富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在农民富、农业兴、农村稳的伟大事业中尽了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应尽责任，正在实现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人生的最大价值。

我在农民富、农业兴、农村稳的伟大事业中尽了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应尽责任，

百舸争流

学成归国后，祖国为我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实现理想抱负的广阔舞台，并着力培养我，一步步把我推举到领导岗位。1997年，我被评为中国农科院首批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同年任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选，同年任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2001年12月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除了继续搞好所担负的科研工作外，还要投入相当精力致力于建设一支农业科技国家队。2000年11月底，走马上任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后，我根据国内农业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一些研究室、课题组和经济实体进行优化重组，加强了应用基础项目研究，强化了质量检测方面的软硬件建设，提升了蔬菜、花卉研究面向市场的能力。

为了切实担负起蔬菜花卉研究国家队的责任，我借鉴国外广泛实行的建立农业行业协会的做法，把全国的同行组织起来，牵头成立了我国蔬菜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性组织——中国蔬菜良种产业化协会，引导我国蔬菜产业发展，定期召集全国同行剖析蔬菜产业存在的问题，商讨其发展出路和应对策略，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为了传播农业科技实用知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倡议并创办了《中国蔬菜产业信息》报，把蔬菜花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信息及时传递给广大农民，受到全国同行和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和加入WTO新形势的要求，

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除了继续搞好所担负的科研工作外，还要投入相当精力致力于建设一支农业科技国家队。



为了更好地发挥农业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让长期从事农业科研的专业人员从宏观上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拓展他们的宏观思维能力，我除定期组织全国的科研骨干进行专业领域的研讨外，还经常组织高层论坛，邀请国家计委、农业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官员以及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与农业科研人员进行对话，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解，不仅极大地启发了农业科研人员的思维，同时也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科学合理地进行科研立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科研单位的领导，我还注意发挥中青年专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权、责、利交给他们，为他们能够接好事业的接力棒创造条件。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当所领导五年来，我原所在的蔬菜花卉研究所培养出十多名博士、50名硕士（含委托培养），获得各类成果奖30余项。



与此同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蔬菜花卉所科研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国际影响显著扩大。建成了农业部蔬菜品质检测中心综合实验大楼；中荷园艺作物基因组分析国际开放实验室成功启动，运行良好；蔬菜花卉研究所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重大项目也全面启动等等。在科技部组织的重点支持评选中蔬菜花卉研究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系统内名列榜首。

如何让中国农业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农业科研“航

我还注意发挥中青年专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权、责、利交给他们，为他们能够接好事业的接力棒创造条件。

我们正在抓住一切机会，积极争取国际资金和项目，在我国有特色和优势的地区与发达国家共同建立研发基地，带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带领全国农业科研的“联合舰队”担负起历史使命，院党组提出了建设“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即用5~10年时间将中国农业科学院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内一流的农业科技产业孵化中心和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心。经过认真分析和反复论证，已经成为中国农科院院长的我，适时提出了加强我院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两大主题，即通过国际交往，加速农业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把科研、开发和管理骨干送出国门，以积极的姿态全面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贯彻“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思想，开阔视野，壮大自己。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我们正在抓住一切机会，积极争取国际资金和项目，在我国有特色和优势的地区与发达国家共同建立研发基地，带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2002年6月，我院在地处京津冀“金三角”的河北省廊坊市建立了集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综合集成、国际交流于一体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对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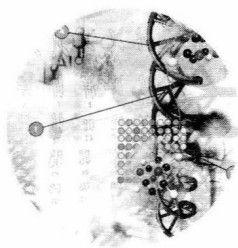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永远牢记肩负的使命，与我的同仁们一起，牢牢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农业科技的主战场上把准方向，开足马力，争得主动，扬帆前行。



饶子和

饶子和，1950年出生。1973~1977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学习，1977~1979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任研究实习员、1979~1982年作为梁栋材院士的开门弟子攻读硕士研究生，1982~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助理研究员，1985~198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9~199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作博士后，1992~1998年任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1996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导，1999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础科学班导师，2000年至今任“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

我1977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有幸成为梁栋材先生的开门弟子。能做梁先生的研究生，还是很荣幸的，他当时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跟随梁先生读完



我受当时这种潮流的影响，也开始多方联系出国学习的事儿。

硕士，我留在生物物理所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做出了一些成绩，并帮着梁先生带研究生。

当时国内正盛行“出国潮”，大家普遍的心态是，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太多了！太想到国外去看一看了！高校科研院所的许多人都在申请出国研修。我受当时这种潮流的影响，也开始多方联系出国学习的事儿。

1983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的Neil Isaac教授邀请我到 he 那里，参加他的研究小组。应当说，当时在国内从事的科研工作给了我很好的经验，我很容易就申请到了奖学金，拿到了Offer。但梁先生不同意我走，我很尊重梁先生，这事就只好先搁下了。

但Isaac教授却一直对我颇有兴趣，还是希望我能去！1984年，恰巧梁先生到德国汉堡参加学术会议，Isaac教授也出席，他就当面向梁先生提及我到墨尔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事情，没想到梁先生当场就答应了。但我并不知情，当我鼓起勇气再次跟他提出国学习时，准确地说，他是把我好好地“骂”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从我的实际情况出发，早已为我安排好了出国学习的事。

1985年初，我开始了在海外学习发展的征程。在墨尔本大学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想换个地方去作博士后，四方联系中，我拿到了很多的Offer，但究竟去哪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要说我最终选择到牛津大学，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邀请我到牛津大学的Stuart教授，1981~1982年曾作为英国皇家学会Fellow在梁先生的实验室作过博士后，我们在北京时就有很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当时牛津大学的研究和梁先生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女儿的教育问题也是我考虑到牛津的重要原因之一，谁都愿意把